

# 论十三世纪中国江万里崇高的历史地位

徐明德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江万里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再传弟子、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老师、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名宦,他重视教育事业,在知州、知府任上的短短两年内接连创建三所全国第一流的书院,培养了文天祥等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才,成为 13 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他为官清正廉明,不仅写下了《江文忠公家训》严格要求家人,而且做到“平生不受半分钱”、“为官彻底清”,他刚直不阿,与权奸贾似道之流坚持斗争,成为朝廷的“骨鲠之士”,并撰《宣政杂录》作为“靖康之难”的一面镜子来教育人们,他视死如归,与国共存亡,不仅是中国 13 世纪以来历代民族英雄的光辉典范,而且成为 13 世纪中国政坛清正廉明的政治家。江万里精神,是中国民族英雄之魂。

【关键词】江万里;名宦;教育家;政治家;民族英雄;书院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1-0027-09

##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Jiang Wanli

XU Mingde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Jiang Wanli was a well-known official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 student of the philosopher Zhu Xi and teacher of the national hero Wen Tianxiang. With a firm belief in education, he established three academies and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well-known figures. His *Jiang Family Admonitions* and his experience as an upright government official became a mirror for the administrators in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model politician for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nd is still greatly respect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Jiang Wanli; Thirteenth Century official; educator; politician; national hero; academies

## 一、中国古代史上流芳百世的名宦

江万里,字子远,号古心,宋宁宗庆元四年戊午十月十六日(1198年11月16日),出生于江南西路南康军都昌县延昌乡林塘柏树下江村(今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府前江村),曾祖江英,曾受封惠国公,祖父江璘是地方富户,过着隐居教书的生活。父亲江焯,在理宗朝进士及第,初授全州(治今广西省全州县)教授,后调陕州(治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宜都尉、抚州金溪县尉,寻权静江府(治今广西省桂林市)阳朔县知县,又迁江南东路提举常平司转江南西路提举茶盐公事,淳祐五年(1245)任大理寺卿参等,为官数十载,以“洁廉匡敏”著称,最后以奉议郎致仕。兄弟五人,长兄万九,以《周易》擢乡贡,隐居乡间教授生徒;三弟万顷,以《周易》预江右漕闈首选,历任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知州、江西提举常平使、知南剑州(今福建省南平市),转奉直大夫、临江军知军(今江西省清江县),

[收稿日期] 1999-10-30

[作者简介] 徐明德(1935-)男,浙江德清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明清史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编著《明清史》。

转朝议大夫,升户部尚书等,四弟万金未仕,五弟万合精通经史,以《周易》擢乡贡,也在家乡设馆授徒。江万里从小天资聪明,在儒学文化的熏陶和都昌崇尚文化教育的民风影响下,学业上进步很快。他少年时代从父、祖习《周易》,又“听乃祖讲《论》、《孟》、《中庸》、《大学》,夫人(祖母)点记要语,时时申戒,俾勿忘。”<sup>[1]</sup>18岁进白鹿洞书院,成为理学大师朱熹的再传弟子,24岁肄业,善治《周易》。然后游学隆兴府(治今江西省南昌市)东湖书院,25岁(1222)到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市)入太学上舍深造,文声颇大,连太子赵昀(宋理宗)也非常赏识他,“尝书其姓名几研间”。29岁(理宗宝庆二年)举进士及第。其殿试策论《子仪单骑见虏》一文,见解精辟,文字洗炼,全文仅一千三百余字,使主考官称赞不已,批语曰:“写得子仪心事出,立意深而措词婉,叹惜之意溢于言表,高古之文也。”一时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被宋代京学教谕魏天应编入《论学绳尺》中的《论诀》卷,成为当时太学生必备的应试辅导资料。直到清代《论学绳尺》又被收入《四库全书》。江万里考中进士,在秘书省供职四年后,才于33岁外放池州(治今安徽省贵池县)文学教授,36岁,迁沿江制置司准备差遣,37岁,调两浙安抚司干办公事,38岁,三月除秘书省正字,39岁,二月除秘书省校书郎,十一月除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40岁,除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六月权尚书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九月除著作郎,十月差主管华州云台观,43岁,知吉州军兼提举江西常平茶盐,44岁,在吉州知州任上创办白鹭洲书院,自任教席与山长,45岁,迁升直秘阁,江西转运判官兼权知隆兴府,又创办宗濂精舍。同年,又囑南安军(治所在今江西省大余县)知军林寿,创建道源书院,46岁,召赴临安,迁考功郎官、直秘阁,主管建康府崇禧观,改差主管绍兴府千秋鸿禧观,47岁,迁驾部郎官、尚书右郎兼侍讲,49岁,拜监察御史兼侍讲,50岁,迁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侍御史,51至57岁(1248-1254),遭政敌谗言诽谤,弃官闲居故里。58岁,迁福建转运使、资政殿学士。四月,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八月,以台臣李衢言,罢安抚使,以朝议大夫、集英殿修撰,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59岁至60岁(1256-1257),遭贾似道排挤,再次闲居故里,61岁,辟为两淮宣抚司参谋官,62岁,正月任京湖大使司参谋官,带行宝章阁待制,十月兼国子监祭酒、侍读。十二月迁刑部侍郎仍兼国子监祭酒、侍读,63岁,迁权吏部尚书,64岁,八月自通奉大夫、守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十二月忤贾似道,遭光纯武弹劾,罢吏部尚书、同签书枢密院事之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67岁,以端明殿学士知建宁府兼权福建路转运使,未几加资政殿学士,依旧职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十月理宗崩,十一月度宗临朝执政,68岁,二月奉诏进京,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闰五月进参知政事(副相),69岁正月癸丑忤贾似道,再遭弹劾,罢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大学士奉祠,寓居饶州芝山(今波阳县),71岁,知太平州(治今安徽省当涂县)兼提领江淮茶盐兼江东转运使,72岁,正月二十八日,召拜参知政事,封南康郡公。三月二十三日,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左丞相兼枢密使,以前南康郡开国公,加食邑1000户,实封400户,73岁,正月,江万里主张增加军队,救援襄樊,确保长江喉舌,又忤贾似道,遭鲍度弹劾,二十八日罢左丞相,加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大使,未受任,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76岁,四月遣知潭州、湖南安抚大使、加特进,77岁,正月,因病辞潭州知州、湖南安抚大使,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居饶州芝山。次年三月二十一日(宋恭帝德祐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4月18日),元兵破饶州抵宅院,江万里携外甥刘小村投止水池,以身殉国,享年78岁。

德祐元年四月,宋廷追赠江万里“太师”、“益国公”,谥“文忠”。元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门生刘辰翁迁葬江万里遗骨于都昌县孝行乡十四都石沙湾<sup>[2]</sup>,并撰写墓志铭。后返归故里庐陵(今吉安)学习老师精神,累召不仕元,过着隐居生活。江万里三次遭政敌和权奸的排挤打击,弃官闲居许昌和饶州,历时12年。从29岁中进士到78岁殉国,足有38年忠心耿耿地效劳于南宋政权。他出任过江东、江西、福建、湖南四路的知州、知府、转运使、安抚使、安抚大使,并曾任过中央自部院长官及左丞相兼枢密使等要职。他几十年如一日,奉公护法,爱国爱民,对投降势力和权奸斗争不息,

正如其再传弟子、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生前的一封信中颂扬他的政绩时所说的“先生‘盛德大业，如山如河’；‘文章若雷霆河汉，玉色金声；言行质天地鬼神，丹心白发’”。说明江万里政绩出众，道德文章，也堪称一代宗师，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流芳百世的杰出名宦。

## 二、十三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 (一) 创办全国第一流的书院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政治日趋腐败，多数国君沉迷于酒色淫乐之中，学校、官学、教学严重衰落，但却出现私学迅速发展的现象，尤其是书院教育成为宋代培养人才的重要教育机构。而只存半壁河山的南宋时期（1127—1279）堪称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江西是当时全国书院教育最发达的地区，距南康军治北7.5公里的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拥有生徒数千人，是江南最高学府，为全国最大的书院之一，经过南宋理学大师、著名教育家、南康军知军朱熹的整顿，跃居全国四大书院之首。

书院既是教学机构，又是学术研究机构。书院教育虽然不是全都反对科举，但却不怎么重视科举，在政治上多少代表“清议”一方，批评朝政。到了南宋，书院又往往既是理学家讲学的场所，又成为纪念理学大师的地方。书院教学的特点是提倡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即自学为主），课程分三类：诗歌、习礼、读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学生自学读书，解答疑难问题。

江万里从小受家庭良好的《周易》训练，然后肄业著名的江南最高学府——白鹿洞书院，成为著名教育家、理学大师朱熹的再传弟子，又游学于东湖书院，最后经国子监直接管辖的太学上舍深造，成为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材。江万里侄子江鉴说：“古心先生遂大明《易》学，扬六馆，策高第，且以古文为天下倡，世谓复生（轶、愈）、欧阳修也。”<sup>[3]</sup>当他出任吉州知军后，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看中了吉州城东赣江中心的白鹭洲，此洲独立于江之中心，两水平分，景色迷人，古刹梵寺林立，是办学育才的理想场所，江万里便借用唐代诗人李白“二水中分白鹭洲”之佳句，以朱熹为楷模，依照白鹿洞书院的规模和体制，创建了“白鹭洲书院”，并筑文宣王殿、云章阁、道心堂、“周程张六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祠”，收藏图书，广招生徒，备有学田租八百石。他自任山长（又称堂长），亲自为诸生讲授经文。由于这座书院规模大、藏书丰富，又地处吉州经济文化之中心，一时成为学者云集之地。宋理宗还御笔赐额“白鹭洲书院”，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并称为“江西三大书院”，直到清代仍是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友教书院齐名的“江西四大书院”之一。次年（1242），江万里迁直秘阁，升江西转运判官（又称漕臣）兼权知隆兴府时，在府城望云门（今德胜门）外龙沙岗（唐观察使路嗣恭故宅），再创“宗濂精舍”，收聚生徒，讲学其中，并建祠祀周濂溪（敦颐）先生等，宋理宗又御赐“宗濂精舍”匾额。接着，于同年又嘱托南安（今南安县）知军林寿，在东山王文公祠后，将大庾县（今大余县）原“三先生（周敦颐、程颢、程颐）祠”扩建为“周程书院”，宝祐五年（1257）改名“道源书院”，景定四年（1263），宋理宗第三次赐额“道源书院”，建云章阁藏书，设租田贍助学者。

一位知州和知府，能在两年内创建三所著名的书院，并获得当朝皇帝多次御赐匾额，这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确是一件了不起的罕见大事。

### (二) 提倡教育兴国，努力培养建国人才

江万里一生从政38年，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首任的外官便是池州教授，接着担任两处王府的教授，后到中央兼任翰林侍讲、侍读，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说经义，备顾问应对，两度兼任全国

最高学府管理机构国子监祭酒。69岁至70岁(1266-1267)遭权奸排挤寓居饶州时,适逢江东路黟县(今安徽省)江村族长江淳万“因辑会通谱,适芝城讨旧宗,闻万里贤归”<sup>[4]</sup>;礼请至黟受业焉。江万里到黟县后住在江村石鼓寺,边读书,边讲学,主要教授江氏子孙,其中以江寅简、江一鶚成绩最为出色,深受江万里器重。在其精心指导下,江寅简与江一鶚双双荣登进士金榜。不久,江万里再度从政,江氏族长江淳万代表全族赞助江万里不少银两,作为对江万里重视教育事业有功的嘉奖<sup>[4]</sup>。

江万里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识非常深刻,早在七百多年前他就提出教育兴国的主张,创办白鹭洲书院时,他在《聘堂长书》中明确提出“某自入境以来,允惟教化,为政务先”。后在国子监祭酒任上,撰《跋景定元年更学令御札》,反复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为只有重视教育事业,才能广出人才,他写道:“臣闻天地之于植物,栽者培之,自拱把合抱以至于耸壑昂霄,无不能尽其材者,此天地成物也。本朝列圣,开设雍庠(学校),士出此途,蔚为时栋,光明硕大,与国无穷,所得于所养,如鹤鸣子和,声与响随。设遇缓急之机,舌臧之决,油然忠爱不能自己于中,而平时自淑身心,不使有一毫出于规矩尺度之外。教养之功,于斯为盛”<sup>[5]</sup>。

至于如何办好教育,江万里自有自己的主张。他曾对当时只为应付课试和科举考试的浮夸学风大加批评,在《聘堂长书》中指出:“此州(指吉州)尚有文献,士每每可以语道者,独恨学业夺,讲贯课试诱争竞,故向上义理,闻者浸稀”。于是,他要聘任胡楚浚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出来担任山长,以改变学风,注重“实学”。他认为读书应该穷理,即“诵其书”须“学其所以为教”,做到“心领意会”。胡楚浚在《答古心公聘堂长书》中答道:“今先生以一世之贤,为庐陵之师帅,以正传之道,新庐陵之声游”<sup>[6]</sup>;“白鹭洲(洲)岂故白鹭洲(洲)也乎?翼然有堂,俨然有师,袪然有徒。先生招诸生而诲之,某亦与一人焉,敢以书谢,然弟子于先生,不取其私谢,而取其不负。”何谓幸?亲见先生而师之是也……沐其教,嗜其学,负之尤不可。”通过长期教学实践后,江万里给再传弟子文天祥父亲撰写《革斋先生墓铭》时,阐明学校教育终于造就了文天祥这样一代捍卫国家的栋梁之才,他写道:“宝祐丙辰,进士试御前,上览对言,亲擢第一人,赐及第,胪传而名之,为庐陵(吉州)文天祥。……予尝受郡印于兹土矣,惟学校之化滋,急士相厉,其为四海之广,而往往擅魁特焉。然一第未也,少年论天下事,无不尽刊,春华以既秋实,器端识远,更可为贵珍耳。”<sup>[6]</sup>考官王应麟评论文天祥的殿试策论:“是卷,古谊若龟窟,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sup>[7]</sup>文天祥的同学、江万里的再传弟子与幕僚刘辰翁,在《白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中,对江万里的教育思想与业绩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使“缙绅德之,吏民怜之,悍卒化之,去之”。江万里非常重视书院山长的选择,他的择师标准是:行谊正、品格高、学问深,三者不可缺一。胡楚浚、欧阳守道完全符合这三条标准,于是除了胡楚浚,他的门人欧阳守道被选为继胡之后的第二任白鹭洲书院的山长。欧阳是一位悉心教育事业、积极进取、治学有方的大学者。他上任后,书院生气蓬勃,生徒们以乡贤“四忠一节”<sup>①</sup>为效法的楷模,相互砥砺,使书院学风和生徒的学业迅速提高,白鹭洲书院一时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宝祐四年(1256)进士科殿试,白鹭洲书院学生文天祥考中状元,同时有39名吉州考生与文天祥同科进士及第,显示了白鹭洲书院优秀的教育质量。6年以后,即景定三年(1262),白鹭洲书院又有刘辰翁、邓光荐等47名吉州学士跃登进士榜。白鹭洲书院优秀的教学质量也促进了吉州地区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继文天祥之后,又有17名吉州籍学子先后荣登进士科头名状元,2728名吉州学子考中进士,出类拔萃者,更以万计。欧阳守道在《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中提到:“吾庐陵士至二三万。”故刘辰翁深有体会地指出:“古心”先生闲居,其志念在国家,其精神在庐陵”<sup>[8]</sup>。

①“四忠一节”指以江西吉州籍五乡贤之谥号为代表的五位杰出人物:文忠公欧阳修、忠襄公杨邦义、忠简公胡铨、文忠公周必大与文节公杨万里。

### 三、十三世纪中国政坛清正廉明的政治家

#### (一) 尽心报国 清正廉明

有史以来,不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做人都要有个标准和原则,否则好坏不分,是非不清,国家将不得安宁,人们必将被推入痛苦的生活之中,甚至在死亡线上挣扎。个人和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国富民强、社会安定,对个人和家庭进行必要的知识和礼义方面的教育,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素质,显得十分必要。但是如此重要的大事,历来却为人们所忽视,而南宋爱国丞相江万里正是这方面做人的典范,他对自己和家庭成员制订了做人的准则和格言,一份278字的《江文忠公家训》如此写道:“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君之所贵者,义也;臣之所贵者,忠也。兄之所贵者,爱也;弟之所贵者,敬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者,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长者敬之,遇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仇将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人有小过含而容忍之,人大过以理而责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见非义之财而勿取,遇合义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学,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奴仆不可不恤。守我之分者,理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谨哉!可不慎哉!”<sup>[9]</sup>这就是江万里概括的我国古代几千年来做人的基本原则和道德标准,至今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江万里的一生,就是其“家训”的实践者。他年轻时努力攻读诗书,学习礼仪,进入仕途,就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每次晋升官职的诏书中,连当朝皇帝宋理宗和大臣们都对他赞不绝口。《江万里除秘书省正字制》中,即有“尔万里擢秀璧水”、“古心自鞭,奇奇见于笔力”<sup>[10]</sup>之赞语,此外《江万里除校书郎诰》曰:“以尔万里蜚英舍选,直谅多闻。敷陈说言,切中时病”<sup>[11]</sup>。《江万里除秘书郎诰》曰:“以尔万里,早升黉舍,屡冠文闱”<sup>[12]</sup>。《江万里授尚书右郎官兼侍讲制》载:“尔万里璧海文英,扬历中外,雅有时誉,光价谁其疵之。然玉以石攻,是以成瑞世之宝。”<sup>[13]</sup>他不负众望,对国家尽心以报,为官清正廉明,从出任地方知州、知府、转运使、安抚使,到擢升中央刑部侍郎、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左丞相兼枢密使等,对工作皆兢兢业业,不取一分非义之财。如淳祐二年出任隆兴知府兼江西转运判官,途经临江(今清江),风浪大作,他写了《舟中遇风吟》一首投江,以表白清廉:“万里为官彻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平生若有亏心事,一任碧波深处沉。”<sup>[14]</sup>这不是在对天盟誓吗!景定五年(1264),以端明殿学士知建宁府兼福建转运使时,在赴任途中又作《辟妖禽吟》:“去国离家路八千,平生不受半分钱,苍天鉴我无私意,莫使妖禽夜叫冤”<sup>[15]</sup>。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相隔22年,充分反映出江万里67岁以前清廉自守的高贵品德。这也与江万里的家教有关,其《水调歌头·寿母》即云:“吾二老,常说与,要廉勤。庐陵几千万户,休戚属儿身。”<sup>[16]</sup>“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评价文臣武将的一条重要标准。江万里面对元军的金钱利诱,更是丝毫不动,他在《嘲元宰相》诗中写道:“钓得金鳌休便休,何须垂上钓鱼钩!昨宵试向江头望,明月芦花别是秋”<sup>[17]</sup>。

江万里关心人民疾苦,注意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在《知螺江府劝农诗》中说:“农岂犹需我劝农,且从人意卜年丰。喜闻布谷声声急,莫为催科处处穷。父老来前吾语汝,官民相近古遗风。欲知太守乐其乐,乐在田家欢笑中。”<sup>[18]</sup>度宗咸淳四年知太平州兼提举江淮茶盐、兼江东转运使时,他又撰《江东漕司劝农文》:“良农竭力尽分,胜如士大夫之貌虚伪”<sup>[19]</sup>。他把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地方官应该爱民乐民的思想,阐述得一清二楚。

江万里博学多才,为官清正廉明,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表现,在他多次晋升官职的诏制中有所反映,如《江万里除吏部尚书制》说他是“国之菁莪,学者斗山”、“文字五千卷,混混江河之发源;仁义数百篇,炳炳丹青之垂世”、“闻国难则投袂而起,建师行则载笔以从”、“门庭有毛玠之清,衡尺如山涛之审。但见拳拳于国事,未尝汲汲于自谋”<sup>[20]</sup>。《江万里除资政殿学士依旧任制》中称赞他“学自丘轲,道陈尧舜。文章行世,则江河万古之流;论谏忧时,则仁义百篇之奏。积由人望,擢在政涂。大僚贵倨,汝则平易近民;浮俗夸奢,汝则清修苦节。治有异等,人无间言。既奏再于雄藩,合升华于秘殿。”<sup>[21]</sup>《江万里该遇明堂大礼加恩制》又称他:“斯文羽仪,学者师表。色正芒寒之始,鸿名已塞堪舆;根茂实遂之余,大可著廊庙。乃春七闽之巨镇,特烦二府之元臣。”<sup>[22]</sup>《江万里为左丞相制》曰:“具官江某,高邵而怀忠,魁宏而迪哲。其为人好善,有忧天下之风;将以道觉民,有思匹夫之志”。“成汤初年,盖已得伊氏;吕尚既老,盖入相有周。”“维大人之能文,乃平生之素志。德无朋比,无援其矫哉。”<sup>[23]</sup>以上四篇诏制所述赞语,不仅说明江万里是才高学丰,关心民瘼的好官,而且表明他是治国平天下的能人。最根本的是他具有“忧天下之风,思匹夫之志”。他的再传弟子文天祥说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不仅具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而且又兼备司马光的博学多才。文天祥写道:“今先生(指江万里)早以言语妙天下,中以政事动中朝,后以气概风度上结人主之知,而下为四海所倾慕。则先生都范、马之望于一身。”<sup>[24]</sup>又说他“于前辈人,期之以伊尹、傅说;今从学者,尊之如韩愈、孟轲。尚论公之平生,有报国之大节。以君子不用为我耻,以小人未退为己忧。童儿妇女,知其血忱;缙绅大夫,想其风采”<sup>[25]</sup>。当咸淳八年(1272)元兵攻襄阳,危在旦夕,境内又有农民起义之时,宋度宗下诏向江万里表乞言之意,希望他再出来秉理朝政。诏曰:“卿以惇心正学,辅国视政,超贤远识,为时耆艾。若朝廷之典章、军国之机务、生民之休戚、政治之得失,皆常履而知矣。愿卿悉心以告以副”<sup>[26]</sup>。于是,江万里又于次年出任湖南安抚大使知潭州。故黄仲元在《上江古心先生书》中评论道:“古心先生,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者也。”<sup>[27]</sup>

## (二)为国为民,刚直不阿

江万里抱着为国为民,做个正人君子的目的活在世上,对祸国殃民、贪官污吏之事深恶痛绝。“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责之”。这就是江万里秉性峭直、凛凛正气的思想的反映。淳祐五年十一月,江万里在监察御史任上,对依仗权势,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祸国殃民之朝官林光谦、袁立儒、宣璧、王至、刘棫、施逢辰、刘附等进行弹劾,于是理宗下旨:“夺林光谦三秩,徙居衡州;夺袁立儒、宣璧、王至各一秩;夺刘棫、施逢辰、刘附各两秩。”<sup>[28]</sup>次年六月,中书舍人徐元杰暴卒,人疑被权相史嵩之毒害,江万里等上疏为徐元杰鸣冤,结果史嵩之罢相;“永不复用”<sup>[29]</sup>。宋理宗称赞江万里是“骨鲠之士”、“魁礧骨鲠之臣”,于是“察其(指江万里)悉忱,付以言责”。制敕称其是“经明修行,出长入治,峻陟旃厦密罄,忠嘉恳恳,为世道反覆,元佑、绍圣之劝戒,而必纯一于君子道长之望,其于理乱存亡之机,入朕心深矣。”<sup>[30]</sup>江万里一切以国家大事为重,襟怀坦荡,敢说敢为,淳祐五年三月任驾部郎官时,他向理宗提起端平年间革新朝政,因而言及元祐年间更改役法的事情。宋理宗说:“只是因为太急切罢了”。江万里回答说:“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理宗又说:“元祐年间的君子也互相攻击。”万里答道:“这就是小人所以能够乘机而入的原因。现在召纳的贤能君子不多,恐怕正气不壮,不能够战胜邪气,全在于陛下的把握了。从前在端平初年,因为把握不定,所以改革没有超过绍圣年间。现在如果第二番把握不定,收复就没有指望了。”<sup>[31]</sup>理宗点头同意。江万里又指出,两宰相退位太过分了,朝廷内外都没有精神,理宗又点头同意。江万里常与贾似道发生冲突,但都不计较个人得失,史载“万里在似道幕下最久,虽俯仰容默,然性峭直,临事不能无言,似道常恶其轻发,故不能久于其位。”<sup>[32]</sup>在民族矛盾严重的关键时刻,江万里也总是挺身而出,如淳祐五年任驾部郎官时,力劝宋理宗任用抗战派将领赵葵主持兵事,陈靴

主理财政<sup>[33]</sup>，一度使南宋政权有所振作，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知人善任的胸怀。但好景不长，赵葵只当了五年丞相便被保守势力夺去了权力，南宋政权再度陷入困境。但江万里的斗争精神始终得到宋理宗的夸奖：“尔金百炼愈刚，壁万仞而特立”、“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极力破权门之死党，奋身主善类之齐盟，精白一心，剴切百奏。”<sup>[34]</sup>咸淳元年（1265）宋度宗赵奩刚即帝位，江万里进升参知政事（副相）重任。这时边境吃紧，窃居相位的权奸贾似道不但以师相自居，而且又以辞职要挟年轻无能的国君赵奩，吓得赵奩几乎痛哭流涕，要对贾似道下跪挽留。江万里实在看不下去，挺身而出，拉住度宗，劝道：“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弄得贾似道也无所适从。下殿后只好举着朝板，笏，感谢江万里：“微公，似道几为千古罪人！”但在骨子里却恨死了江万里的举动。度宗每次在经筵讲座时，经常问一些经史中的疑难问题和古人的姓名，贾似道常常不能解答，于是江万里从旁给予代答。这不但不能受到贾似道的感激，反而更遭到他的妒嫉与愤恨<sup>[35]</sup>。咸淳六年元军围攻襄阳樊城，战争形势十分危急，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的江万里，深知“襄樊国之捍蔽，所以共存亡者也。”<sup>[36]</sup>一旦天堑失守，元军必将沿汉水南下入长江，夺取武汉三镇，然后居高临下，以猛虎扑食之势直取临安，南宋残局到那时将一去不可收拾！于是他“以襄樊为忧，屡请益师往救”<sup>[37]</sup>，但屡遭贾似道的阻拦。贾似道对元军一味妥协求降，在襄樊被围困的最危急时刻，他竟在西湖“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sup>[38]</sup>。对襄樊之危坐视不救，而且其权势也达到顶峰，无人能予制止。只有太学生胡洪范以咸淳间星变为由，上书弹劾贾似道专权误国之罪，贾似道欲置之死地，结果“国子监诸生伏阙申救，不允，幸丞相江万里抗疏力称其（胡洪范）无罪，得释归。”<sup>[39]</sup>江万里再三主张增兵解救襄樊，不但无法实施，而且屡遭贾似道等投降势力的打击、排挤、弹劾，他自度势单力薄，无回天之力，只得第四次提出辞丞相之位，最后奉祠闲居于故乡。

宋理宗与宋度宗都是荒淫无能的国君，史载度宗好色，一个晚上竟多至30名妃嫔服侍<sup>[40]</sup>，只好委政于外戚贾似道（宋理宗贾妃的弟弟）。贾似道拥权控制两帝与舆论，垄断朝政。但江万里始终为国家着想，经常对两帝进行劝戒，其名言“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便是劝戒理宗、谈及端平（1234—1236）更新时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他还别开生面地用“谏郡公”之名撰写了《宣政杂录》一卷<sup>①</sup>，把北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的奇异怪闻，作为“靖康之难”的先兆与预言，名之“宣政杂录”。因为宋徽宗赵佶重用权奸蔡京、童贯等，致使朝政腐败，国事荒芜，最后导致“靖康之难”的出现，徽钦两帝成为金人的俘虏。南宋末年和北宋末年政和、宣和时期的政治十分类似，国君皆昏庸无能，国柄操在权奸贾似道的手中，他们在强敌面前乞降求和，对抗战派人士大加打击、排挤。江万里希望人们能借此清醒头脑，以《宣政杂录》和“靖康之耻”作为一面镜子，重振朝纲，巩固南宋的半壁江山，可谓用心良苦。

### （三）晚节可贵，一代楷模

生与死历来为人所关注，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似鸿毛？是死得其所，还是贪生怕死？这历来成为考验人品的一条重要标准。江万里视死如归，表现出与国家共存亡的崇高民族节操，成为13世纪以来历代民族英雄的光辉典范。咸淳九年，76岁的江万里出任湖南安抚大使，目睹战局如江河日下，遂会见了湖南提刑文天祥，嘱他担负起卫国抗元的重任。他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贵，其在君乎，君其勉之！”<sup>[41]</sup>二月，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次年元军水陆并进，直指南宋都城临安。时江万里已77岁，年老体弱多病，深知自己不能为国效力，便在咸淳十年辞职引退，独居饶州芝山，曰：“吾宋臣，宜当死于宋土。”<sup>[42]</sup>“凿池芝山后圃，匾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sup>[43]</sup>。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元军破饶州，知州唐震殉难，通判万道同

① 江万里的《宣政杂录》分别被收入《说郛》卷二六、《续百川学海》、《古今说海》、《历代外史》等丛书中。

降元,而江万里仍镇定自若;“从容坐守以为民望”<sup>[44]</sup>。直到元兵冲入其宅,才起身离座握着门人陈伟器的手与之诀别,泣曰:“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共存亡。”<sup>[45]</sup>然后,携外孙赴止水殉国,家人也效其忠,投水相从。

文天祥获知老师江万里为国殉难后,悲痛万分。他历尽艰难,在知江西赣州任上组织抗元武装,率兵入卫临安,次年知临安府,旋升右丞相兼枢密使。后奉使元营谈判,痛斥伯颜,被拘,在镇江脱逃,至温州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昀于福州,复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在福建、江西、广东一带抗击元兵,收复州县多处,一度取得胜利。由于南宋政权的败局已定,势不可挽,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在广东海丰北部五坡岭,文天祥兵败被俘,作《过零丁洋》诗,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拒绝招降,被押赴元大都(今北京市)。在狱中三年,屡经威逼利诱,坚拒不降,作《指南录》、《正气歌》以示心志。并经常追忆老师江万里,曾写道:“公家番禺,城陷,义不辱,自沉而死。予洒血襁褓,颠沛驰驱,卒以孤军陷没,无益于天下。追忆公言,辄为流泪”<sup>[46]</sup>。可见,江万里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坚持抗元斗争及其宁死不屈精神的楷模。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文天祥在元大都柴市含笑饮刃,英勇就义。元世祖忽必烈赞叹其为真男子。江、文师生谱写了13世纪中国南宋史上最壮丽的诗篇,明代民族英雄于谦,清代民族英雄张煌言和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等等,都以江、文师生的言行为楷模,在中国古代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

七百多年来,江万里爱国爱民,为国捐躯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这就是中华民族英雄们所共同具有的灵魂。江万里虽然没有被历史学家列入民族英雄之林,但他的所作所为,足以表现出民族英雄们的共性:他为人,被称誉为“学者斗山”、“一代宗师”;为官,清正廉明;“平生不受半分钱”;为国,“丹心白发”,杀身成仁;为民,“庐陵几千万户,休戚属儿身”;处事,公而忘私,刚正不阿。其门生文天祥受其身教言传,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在座侧悬挂文天祥画像,并题赞辞曰:“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生卧小阁,困于羈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死,弗苟而全。再向南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于是抱着“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宏伟志愿,下决心“要留清白在人间”,写了《石灰吟》一首:“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又提出“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sup>①</sup>,最后成为明代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道光二年(1822)七月在杭嘉湖兵备道员听候补用时期,在《重修于忠肃祠墓记》中,也表现出对岳飞、文天祥、于谦等历代民族英雄的深深敬佩,后来在赴戍新疆,途经西安与其夫人分别时,留下了为国为民,不顾个人生死的著名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成为中华民族之魂。这一国魂,源于于谦的“要留清白在人间”,又出自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且远源于江万里的“城陷,义不辱”、“与国共存亡”的崇高情操。江万里精神,是中国民族英雄之魂。1989年,侨居泰国的江万里第68代裔孙江振顺博士回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约他到家里做客,并赠送给江博士一幅题词,其寓意就是要大家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努力学习江万里精神。

## 【参 考 文 献】

[1] 袁甫·蒙斋集·墓志铭·江夫人巢氏墓志铭[M].《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① 参见明代于谦的《无题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 [2] 俞圣域等. 林塘古迹述略(七)·丞相莹墓[A]. 王东林, 余星初. 江万里研究[C]. 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 339-340.
- [3] 江鉴. 南宋朝议大夫尚书仓部员外郎直秘阁江西提举南剑知郡古崖先生圻中记[A]. 江西都昌江氏大成宗谱·阶勋(卷一)[Z]. 清康熙十三年版.
- [4] 舒育玲, 胡时滨, 宏村. 江万里讲学石鼓寺[M]. 安徽: 黄山书社, 1998.
- [5] 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学校(卷一)[Z]. 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
- [6] 王东林, 余星初. 江万里研究·文氏通谱(卷首)[C]. 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
- [7] 脱脱. 文天祥传[A]. 脱脱. 宋史(卷四一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8] 刘辰翁. 须溪集·白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M]. 《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 [9] [14][15][16][18] 江氏大成宗谱(卷一)[Z]. 康熙十三年版.
- [10] 吴泳. 鹤林集·外制(卷一)[M]. 《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 [11] [12] 许应龙. 东涧集·诔词(卷三)[M]. 《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 [13] 徐元杰. 鳌野集·制(卷六)[M]. 《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乾坤正气集》).
- [17] 王东林, 余星初. 江万里研究·济阳江氏宗谱[C]. 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
- [19] 王梓材, 冯云濠. 宋元学案补遗(卷七〇)[M]. 《四明丛书(第五集)》, 1937.
- [20]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六〇)[M].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 [21] [22] 马廷鸾. 碧梧玩芳集·制(卷六、卷七)[M]. 《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 [23] 咸淳遗事(卷下)[M]. 《四库全书》本史部杂史类.
- [24] [25] 文天祥. 文天祥全集(卷六、卷七)[Z]. 北京: 中国书店影印本, 1985.
- [26] 洛阳江氏宗谱. 咸淳八年乞言丞相万里公谥(卷首)[Z]. 江西波阳藏本.
- [27] 黄仲元. 四如集·拾遗(卷五)[M]. 《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 [28] [31][32][33][40] 毕沅. 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一)[M]. 北京: 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1957.
- [29] 脱脱. 宋史·理宗本纪(卷四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30] 徐元杰. 鳌野集·制·江万里授监察御史制(卷六)[M]. 《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江万里除殿中侍御史制(卷六〇)[M].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 [34]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江万里除殿中侍御史制(卷六〇)[M].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 [35] 脱脱. 宋史·江万里传(卷四一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36] 王天策. 宋丞相江文忠公墓墓碑记[A]. 都昌县志·文录(卷二)[Z]. 同治刊本.
- [37] 毕沅. 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一)[M]. 北京: 古籍出版社, 1957; 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贾似道要君(卷一〇五)[M].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7.
- [38] 脱脱. 宋史·贾似道传(卷四七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39] 定祥. 特克绅布, 刘绎, 周立瀛. 光绪吉安府志·人物志·寓贤(卷三七)[Z]. 光绪二年(1876)刻本.
- [41] 脱脱. 宋史·文天祥传(卷四一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42] 王天策. 宋丞相江文忠公墓墓碑记[A]. 沈学耕, 刘庭辉, 董昌蕃. 都昌县志·文录(卷一二)[Z]. 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 [43] [45] 脱脱. 宋史·江万里传(卷四一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〇六)[M].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7.
- [44] 苏佑. 双忠祠碑记[A]. 沈学耕, 刘庭辉, 董昌蕃. 都昌县志·文录(卷一二)[Z]. 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 [46] 文天祥. 文山别集·纪年录[C]. 清宣统庚戌年(1910)东雅社铅印本.

[责任编辑 徐枫]